



## 心灵诗人郭小川

□潘磊

着她。当医生得知植为丈夫的安危焦虑不堪时,又连夜赶路将丈夫平安回到后方的消息告诉她。作为女性,于植也感受到医生对她的深厚情意。当医生医好孩子的病,于植心生感激,她对医生产生了朦胧的情意:“我的面前不断地闪动着他的影子,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最终,于植经历了短暂的游移之后在情感上回到了丈夫身边,保持了情感的忠贞,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诗人着力描绘的是她与医生之间基于个人情感所产生的介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感情。有意味的是,诗人对于这段感情的态度。他借于植之口吐露了自己的看法,即使于植的感情有过游移、彷徨,但这并不妨碍她感情的纯洁,“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洁白”。在个人话语几乎没有表达空间的年代,郭小川借助女性视角表达了对他人的感情复杂性的尊重与理解,将女性复杂多样的情感世界作为审美对象进行了丰富的开掘,正如诗歌中的诗句,“不仅要像雪那样洁白,而且要像雪那样丰富多彩!”这无疑是在宣告人们生活与情感的丰富与多元的合理性,人的价值存在也应该是多维度的。

如果说《白雪的赞歌》是诗人借助女性视角对人的情感的丰富与复杂的合理性进行正名,那么《深深的山谷》和《一个和八个》则有着郭小川自我经历的投射,从诗歌中我们仿佛读到了郭小川内心的矛盾、挣扎、焦虑、冲突。《深深的山谷》中的知识分子出于理想奔赴延安,性格柔弱,不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面对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女友,感到了两人的距离逐渐拉大,最终选择了葬身“深深的山谷”。诗歌中的“他”清高、孤傲、聪慧,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考虑的是个人的情感与欲求。他对自己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非常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当时主流的革命伦理,“我呢,我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本性的善良,他对仍然爱恋着他的大刘怀着深深的祝福。他不革命但也不背叛革命,“当然我也不愿意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从中可以见出,诗人并不抱着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存在着过渡地带,一些本性善良的知识青年就在此徘徊、彷徨,诗人对于这类知识分子给予了同情性的理解。因此,诗歌的最后,虽然女主人公大刘和志同道合的指导员结了婚,但心中始终纪念着在延河边的这段爱情,不断在心中重构着恋人的形象,“一个不平凡的男子,黝黑的脸上突起而来高高的鼻梁,额头微皱着,露出深沉的忧郁”——整首诗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诗人自述这首诗作的目的是“勾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耻又可怜的脸谱”,但这

个在革命伦理和个体伦理中挣扎的知识青年,无疑也有郭小川自己的影子,当然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追随革命的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情感记忆,因此诗人并没有丑化这类知识分子,而是以同情的笔触真实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复杂心态。从郭小川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郭小川本人也经历过类似的矛盾、挣扎,在中国作协党组工作的郭小川一度非常苦闷,在政治工作与个人欲求的矛盾、挣扎中焦虑不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是文化界风暴的中心。作为作协的书记处成员,郭小川也参与了“胡风集团”、“丁陈集团”等批判运动,但本性善良的郭小川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痛苦之中。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作协的工作给诗人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烦恼和痛苦,“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感占有着我,情绪有时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地压人。”(1957.1.11日记)“晚饭后,改陈的结论,许多情况弄不清楚,苦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腰又酸痛,身体疲惫不堪,这真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2.17日记)与此同时,作为诗人的郭小川也在疲惫的工作间隙进行诗歌的构思、创作,并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决心在蕙君回来之前,完成这首长诗……总共一千行。为了把这首诗献给读者,纪念蕙君这一次旅行,我真感到快乐。”“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1957.5.25日记)“又写了几行诗,思索着《白雪的赞歌》的修改问题,整天为创作冲激着。”“又愉快,又美丽,生活常常有这样幸福的时刻。”(1957.11.24日记)在日常工作与诗歌创作的矛盾冲突中挣扎的他不断写信给邵荃麟、刘白羽,希望能够离开作协,到下面进行创作,他甚至想过,只要能离开作协,即使受处分也没关系,也是值得的。但他的举动招致了作协对他的批评,被认为是在“向党要名誉要地位”。在作协领导眼中,郭小川成了与《深深的山谷》中的青年一样的“个人主义者”。

《一个和八个》虽然触及的是革命内部冤案这一题材禁区,但其中也有着郭小川自身痛苦经历的投射。革命者王金被当作敌方派来的奸细与八个犯人共处一间牢房,他处境艰难,既受到同狱的八名罪犯的挑衅、欺辱,也被他所忠诚的革命组织所抛弃。在这一绝境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力图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影响这些罪犯,并在军队遭遇袭击时挺身而出,指挥战役,为革命尽力。王金是诗人理想化的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如此完美的英雄形象,其实折射出郭小川自身痛苦的人生经历。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郭小川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中亲历,成为他心中的隐痛,也成就了他的创作冲动。据诗人自述,《一个和八个》的创作动机来自肃反和延安审干的经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郭小川听人坦白说北平的“文艺青年联合会”是一个“红旗团体”,自己参军前曾参加过这个组织,便以为自己也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所以“马上就急哭了”,到坦白大会上进行了坦白交代。过了近一年,写了十多次检查以后,这个问题才被澄清,得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与此同时,新婚仅一个月的妻子杜惠,被怀疑为“特务”而遭拘押,被监禁在中央社会部的监狱里,长达2年零4个月之久。在此过程中郭小川经受的心灵磨难,在日记中留下了印痕:“我每夜都梦见你……梦见你成了鬼,真可怕,你的脸是白的,而雕浮着可怕的沉默……每天都想到你,想到你也许因病死去,想到你因为‘破坏’党而(被)处死,想到我们将不可能再见面……你不是特务——人类中最阴毒的,动物中最污浊的——假如,你真是,那对于我,就犹如丢掉一个黑色茧子一样丢掉你。可是,你不会是的,你受了别人的牵连的可能居多,正确些,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这看作是冤枉,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从中可见诗人在信任组织与信任恋人之间痛苦的徘徊与游移。有意味的是,诗人在诗歌中将自己在审干运动中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置换了对王金这一理想化的革命圣徒的塑造。对待冤屈,王金当然是痛苦的,得知叛徒的指控时有点儿“惶乱”和“惊恐”,听到锄奸科长的愤怒声讨“像刀子般割着我的心”,听到科长怒斥他这个“无耻的叛徒”,王金的“嘴唇颤抖”了,“每条神经都感到疼痛”。但他又大度、从容,极力配合组织的工作,以“严肃”的负责的态度,陈述了这个事件的全部内因”,然后就耐心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置。当得知已经没有可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王金想用最后的时间以自己的人格理想来感染、影响身边的这八个罪犯。可以想象,诗人塑造这一理想化的革命者形象,也在以自己构想的悲壮、决绝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与委屈,当然也有以此表明自己对组织的绝对忠诚的成分。因此,在看似完美的革命圣徒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内心痛苦矛盾的心灵世界。

作为那个时代的“心灵诗人”,郭小川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新颖”而“独特”的东西,那就是对于走向革命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的多面性的探索。但他的努力,尝试遭遇了一系列的严厉批判:《白雪的赞歌》被认为“脱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轨道”,“通过个人的琐事,小事化大”,“是资产阶级文艺道路”;《一个和八个》更是受到激烈的非议和批判,“这首诗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并且充满了人性论的观点,宣扬‘人格力量’、‘主观战斗精神’等反动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受到批判之后,主认错的郭小川得以如愿以偿离开了作协,到《人民日报》做了一名记者,到各地采风的生活让他有了精神上的放松与平静。但一直努力形成自己诗风的诗人,放弃了“心灵”探索,写下了《林区三唱》《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与时代主流吻合的作品。从辞章、诗体形式来说,是华美的,但失却了心灵之韵。正如他的女儿郭晓惠所言,“从此以后,他从飞鸟变成了一只走兽,把外在的控制内化为自身的禁锢。于是,心灵上锁。”

期,那时创作的一系列优秀作品,都能让我们感受到郭小川的深沉思考和磅礴激情。《青纱帐》和《甘蔗林》也是他创造的两个鲜明意象。《青纱帐》代表过去战争岁月,“甘蔗林”象征当今的和平生活,正如“乡村大道”上会有那么多“沟壑”和“风波”,“甘蔗林”固然是香甜的,可有时也会让人感到“你为什么那样严峻?”这就是郭小川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他不是旁观者,旁观者们此时即便不敢批判质疑,也可以偷偷冷眼看热闹、至少可以闭口不再发声;但他也不是一味迎合、丧失独立思考勇气的投机分子,否则他也可以一味地“歌德”。他是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他觉得战胜这个困难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职责。“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他要做的,就是用笔,用诗句唤起“年轻时代的战友”,“青纱帐里的亲人”,让他们到甘蔗林“聚会”,一起“唤回自己战斗的青春”。

说起郭小川对中国诗坛的贡献,不能不提的还有他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堪称中国新诗发轫以来长篇叙事诗的扛鼎之作。尽管是在“十七年”期间所写,尽管有人人皆知的政治条框,但诗人还是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华,将它们写成了具有经典特质的艺术精品。他是战士诗人,是全心全意相信这个政权、拥护自己领袖的革命文艺战士,他是完全发自肺腑地歌唱,歌声纯洁响亮而又自然流畅。这些诗作在内容方面表现人性的突破与深刻,本文不再赘述。而其文本给人带来的阅读美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诗人自觉的环境细节描写。郭小川非常重视叙事诗中的环境营造。在与朋友的一次谈话中,他这样说:“写非洲,就应该有沙漠和棕榈树。为增强艺术效果,就要通过创造鲜活的形象,吸引着读者跟你走,然后,你突然一转身,再把他们领向相反的方向,给他们制造一个惊奇。要做到这样,你就不能仅用那些别人常用的陈词旧语,要有创新,要学会创造新鲜生动的词汇。”(赵兹《我所认识的郭小川》)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郭小川那些长诗带给自己的阅读体验。那些诗句是那么的细腻温婉,体察入微,阅读它们,与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唐璜》等世界名著的审美感受并无二致,甚至在文辞音韵方面的美感超越了阅读那些名作的译文。例如:

“沉沉的冬夜,风在狂吹,星星蜷缩着,在严寒中微睡。”炉火上的水壶打着鼾声,蒸汽在玻璃窗上涂抹花卉。”——《深深的山谷》

“啊,多么鲜明的光亮的田野,田野上铺着一层软软的白雪,微风都仿佛染上了雪的颜色,阳光也像被雪洗涤得更清洁。”——《白雪的赞歌》

“将军凝然不动。/静静地看/静静地听/水波/月影/草舞/虫鸣/蛙叫/涛声/将军说/‘你觉得吗?河水也有心灵。’/将军长出一口气,在岸边走动。/旋转着头,观看四围风景:/巨石,树丛,落叶,流萤,小路,清风。/将军说:/‘你瞧啊,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将军‘啊’了一声,大有感触,看那河水下游,展开庄严画幅:/谷堆,窝铺,场院,高树,大家,大路。/将军说:

(下转第8版)

## 不能忘却、无可取代的郭小川

□阎浩然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抒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

写于1962年的这首《甘蔗林——青纱帐》充分展示了他的战士情怀,若无当年的切身感受和实际体验,绝难臆造杜撰出如此动人的画面和诗句。这些话若由别人说出,可能会让人感觉矫情夸张,但在郭小川笔下,却显得合情合理、真实自然。

新中国建立后,郭小川长期在文化战线上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革命诗情与宏观视角,赋予他不同于他人的气质与高度。更重要的,郭小川是一个真人,一个善人,一个好人。面对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他敏感,他多思,他不能熟视无睹,所以他痛苦,他迷惘,他失眠,他抽烟。在新时代的咚咚战鼓声中,他有那么多疑问、设问和反问;在新时代颂歌大合唱的旋律里,他有时会发出别样深沉的追问和低吟。这也就是他的诗歌与“十七年”其他人诗歌的最大不同之处。

参加革命,他为的不是一己前程、个人幸福;领导作协,他也绝非为满足自己的权力私欲,以踩踏着同伴身体向上爬为乐事。相反,在政治斗争日臻残酷的关头,率真的诗人屡次萌生退意,感到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可是,对信仰的忠诚、对领袖的热爱,让他又不得不忍受煎熬,苦苦支持。在对待丁玲陈企霞问题上,他显示出自己的善良与正直。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良知与信仰。在家信与日记中,他对亲有着自己心灵深处最真挚的感情流露,这些,是我们在阅读其作品之前有必要了解的大致背景。

“我要下去啦——/这儿不是战士长久住居的地方,我要下去啦——/我的思想的翅膀不能在这儿飞翔,我要下去啦——/在这儿呆久了,我的心将不免忧伤,我要下去啦——/简直来不及收拾我一小卷行装。”——郭小川《山中》

单纯、善良的本性让他在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文化界矛盾漩涡中心的郭小川左支右绌,疲惫不堪,他这首《山中》,我们未尝不可解读为那一个年代的《归去来兮辞》,不过他并非像陶渊明那样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他是要投身到建设的最前线,为工农业生产去“作战般地工作”。

“而那机器轰隆的工地和扬着尘土的田野呀,我的心没有一天不向你们飞驰……/我要下去啦——/树叶呀我不能让你载着金色的时光轻轻跌落!/我要下去啦——/秋风呀你不要这样把我折磨!/我要下去啦——/小河呀我要同你一起走向喧闹的生活!/我要下去啦——人们需要我像作战般地工作!”——郭小川《山中》

在四大文学体裁中,诗歌反映时代精神最快

捷、最直接、最鲜明。正因如此,它也很可能成为受政治干扰最大、被政治化最严重的一个门类。君不见,“十七年”乃至“三十年”诗坛众芳摇落,万马齐喑,口号化、标语式作品泛滥成灾。而时过境迁之后,有许多一度风行一时之作迅即被人遗弃,甚至沦为笑柄。

政治,似乎成了艺术的天敌。

可是,果真如此吗?

尽管“十七年”文学政治倾向明显,但这一特征未尝不是溢彩流光的中国文学史链条中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一环。若放在更长久、更宏阔的人类精神长河中考察,“十七年”文学优秀代表作中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未尝不具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与存在价值。“两结合”亦被看做世界文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独具魅力的创作方法。用这个方法书写的,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在向上攀登过程中一段独特历史和一种独特梦想。

评价一个诗人、一部作品,不能离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不能简单地以当下审美趣味来衡量一切时代的经典作品。比如,按今天某些诗歌美学标准看,《黄河大合唱》词句直白素朴,不够含蓄蕴藉;但我们可以否认,它是中华民族的不朽诗篇,是20世纪三四十代的民族最强音,在中华艺术史、诗歌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对郭小川诗歌我们亦当作如是观。

读读郭小川的诗吧,让我们再次回归进入那些美好的字眼,你能产生无比超拔博大的心怀!今天,时代精神变了,人们审美观变了,可是,忠诚、进取、无私、乐观这些品质,难道也该弃之如敝屣?欲望横流、荒诞不经、自私自利、个人中心主义就更有鼓励和宣扬的价值吗?看看当今诗坛吧,哼哼唧唧的自说自话,前言不搭后语的故作深沉、自怜自恋的哀哀戚戚泛滥成灾。诗歌,在大众的心中,早已变得光彩全无、美丽不再。本来,它是多么神圣的字眼!

郭小川诗歌为中国新诗艺术创造了一种雄奇宏阔、幽深高远、真挚炽烈的全新的审美趣味、审美境界。因为诗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亿万团结一致豪迈发声的“人民”。他充当了“时代的号手”。这一点,贺敬之也当之无愧。就其诗风的雄奇飘逸、豪放洒脱而言,他们一点不亚于李白苏轼!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这是一笔永恆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主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郭小川《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我走遍了我广大的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呵!每一个地方。我的每一个故乡……”——贺敬之《放声歌唱》

这些奇绝豪迈的文句是口号吗?是!是!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有宏大叙事固然太单调,可如果一点宏大叙事也欣赏不了,受不了,那口味也未免太单一,性格也未免太偏执,精神也未免太萎缩。郭小川并非北大荒人,他只是跟随王震坐火车去短暂访问了一下。在返程途中,他诗情难抑,文思泉涌,挥而就写成了这首《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回到家里,对妻子杜惠谈起北大荒来,他还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说是在北大荒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现在,这首诗被全文展示在北大荒博物馆里。可以想象,任何有良知、不麻木、不个人主义到极点的人到了那里,站在那块土地上读到这首诗,都会血脉贲张,热泪盈眶!

郭小川作品思想的深度,不仅表现在其长篇叙事诗里对人性的思考、对矛盾的处理上,也体现在《望星空》这样的优秀抒情诗中。作者的真诚与坦率充分体现在其中。对于永恒宇宙的凝望与思考,是古以来优秀诗人常常涉及的话题:曹操举杯浩歌之际,会想到人生如同朝露;张若虚面对春江花月夜,将无限感慨寄托于闲潭落花、游子归舟。李白也曾感慨人生如梦为欢几何,苏轼也曾于顿悟人生如梦之后一樽还酹江月。任何一个赤子仰望星空,都难免感到自身渺小、人生短暂,郭小川亦不例外。在开篇,他用纯粹的现代汉语营造出不亚于前辈诗人的意境氛围:

“但星空是壮丽的,雄厚而明朗。/穹窿呵,深又广,在那神秘的世界里,好像竖着层层神秘的殿堂。/大气呵,浓又香,在那奇妙的海洋中,仿佛荡漾着奇妙的酒浆。/星星呵,亮又亮,在浩大无比的太空里,点起万古不灭的盏盏灯光。/银河呵,长又长,在没有涯际的宇宙中,架起没有尽头的桥梁。……/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澜。/呵,星星呵,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郭小川《望星空》

他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惆怅迷茫。可是,惆怅迷茫之后,并不是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到来,而是意识到:只有将个人溶入集体,将有限生命溶入群体事业之中,才能让短暂的一生获得永恒。面对“终极问题”时,周恩来来说,“生死参透了,还要努力为生”,郭小川则说,“人生虽是短暂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世界啊,由于人的生存,才有了无穷的希望。”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偏离正确方向,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刚刚同年轻共和国经历了严峻考验的诗人,用祖国大地到处可见的“乡村大道”这一意象,委婉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的事业遇到了挫折,不要气馁,不要动摇,不要为一时的困难而消沉低落。只要心存远大革命理想,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困难一定会过去,美好明天一定会到来!

“乡村大道啊,我爱你的长远和宽阔,也不能不爱你的险峻和你那突起的风波;如果只会站在花砖地上旋转,那还算什么伟大的生活!/哦,乡村大道,我爱你的明亮和丰沃,也不能不爱你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不经过这样的山山水水,黄金的世界怎会开拓!”——郭小川《乡村大道》

那个时期也被认为是诗人创作的全面成熟